

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廿七辑

目 录

- 我在红十军的一段经历……江绍林口述 陈远卓整理(1)
- 抗日战争时期贵州省医药卫生概况……罗克聪(9)
- 第一〇三师在武汉外围抗日纪实……赵 旭(18)
- 我参加“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”(简称“民联”)进
行民主活动的回忆……邹维新(28)
- 回忆贵州省抗美援朝骨科手术队……杨洁泉(44)
- 贵州铁道修建史略……陆榘山(55)
- 对国民政府总统府军务局的回忆……吴行中(80)
- 回顾军事停战调处……刘铁轮(92)
- 我在军调部长春分部工作的回忆……吴行中(108)
- 抗日战争时期的“社会行政”……邓庆棠(108)
- 参加司法官考试的回忆……谢名溢(118)
- 建国前贵州气象工作的建立及其发展……李良骥(122)
- 震惊全国的地质专家被劫杀事件……卢昌隆整理(126)
- 贵州自来水创始记实……王家珍(130)
- 记女法官夏玉芳……陈 鉴(136)
- 桂柳会战后的张发奎……李大光(143)
- 回忆贵州战地服务团……何 群(150)
- 埋头苦干的教育家肖协臣……张星槎、龙之鸿(157)
- 贵阳公、私立各级学校教职员的一次罢教斗争
……王尔逊(164)
- 军统工作会议与蒋介石的召见……潘澄清(168)

回忆我在贵州边远农村工作团	张声溶(172)
抗日战争时期我在贵州三青团的一些回忆	蓝 奇(182)
昙花一现的贵州省“保卫团”	罗再启(188)
贵州省训练团概况	汪 念(191)
贵州省义务教育师资训练班概述	陈群镇口述 费良才整理(198)
对贵阳达德中学的片断回忆	罗朝章(200)
忆白崇禧到贵阳出席回民的一次欢迎会	健 行(204)
建国前的锦屏森林学校	刘文芝(206)
在黔西南地区组织、领导所部起义亲历记	万世炯(210)
对熊绍儒先生《解放前贵州教育见闻》一文中的两点 更正	曾昭毅(228)

我在红十军团的一段经历

江绍林 口述

陈远卓 记录整理

我原在国民革命军第十军二十八师娃娃营当战士。1927年9月，军长王天培在杭州被蒋介石、何应钦处死，第十军解体。师长王天锡离职，由周志群代理师长，我随同部队辗转来到江西，编为新编十一师，受第三方面军第九军金汉鼎的节制。1927年冬，我们驻扎在江西上饶的横峰、铅山一带。不久，我连奉令开赴莫家桥驻防。当时红军方志敏部在德兴、玉山和大茅山一带活动，距我们的防地不远。因为部队经常接触红色区域的人，思想上曾受到一定的影响。加上王军长被害以后，第十军将士被逼得东奔西走，无所归宿；大家对蒋介石集团怀有很深的仇恨，同时金汉鼎是滇军，歧视黔军，因此我们这支贵州士兵，对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怀有好感。在我们连队里就有地下党员在活动。在他们的影响下，我们连成立了士兵委员会，士兵委员会的头头匡龙海便是一个共产党员。他个子不高，有文化，懂得很多的革命道理。在他的宣传鼓动下，我们连当时的革命情绪非常高涨。一天晚上约10点过钟，士兵委员会的头头们正在莫家桥头暗堡里开会，在桥上放哨的杨绍武见三排长打着马灯，提着手枪朝暗堡走来，他一时急得不知所措，想制止已经来不及了。这个三排长思想最顽固，平时对士兵又凶又恶，如果让他闯进会场，事情一定会弄糟。因为这次会议是由方志敏派来的代表

主持召开的，更不能让他闯进去。杨绍武一时情急，便开枪将三排长打死。正在开会的人听到枪声，知道外面出了事，便蜂拥而出。当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后，匡龙海当即宣布起义。并布置人去将排长以上的军官都看守起来，防止他们从中捣乱。我听到这个消息后，马上跑回连部（连长曾庆锡是我的外甥，三穗县长吉人），连长正在灯下缝补他的连枪套子，见我慌慌张张地跑来，便问我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我说：“外面宣布起义了，你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你想办法！”我转身跑去找匡龙海，对他说：“你是否要连长一起干？若不要，就放他走算了！”匡龙海说：“要他过去当营长嘛！”曾庆锡原是云南讲武堂毕业，军事上有一套，他平时对士兵很好，士兵们都爱戴他。我转身又跑四连部，把匡龙海的决定告诉他，他迫于当时的形势，就跟着我们走了。到了德兴，当地老百姓抬着酒肉，敲着锣鼓前来慰劳我们。我领了一份酒肉与连长单独在一块吃。他问我：“你看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怎么样，人家咋个搞我们也咋个搞，还有什么说的？只要人家不搞掉你就算好啦！”他当时没说什么。到了晚上，便悄悄带上几个人走了，我们也不去追他。

在德兴驻不几天，匡龙海将队伍拉回莫家桥。这时，方志敏亲自到莫家桥来看望我们。他穿一件蓝布衫子，一条深灰色裤子，着草鞋，说话是江西口音，他对我们说：十军将士对北伐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，蒋介石杀害王天培将军，是他公开背叛革命的具体表现，你们能够认清形势，自觉地投向红军，这是革命的行动。我代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热烈欢迎你们。接着，他将他的大哥方××留下，作为我们这个起义部队的党代表。我们在莫家桥进行整训。当时，我们所在的这个部队有三个连，番号也还没确定。一连和二连由当地游击队组成，我们在莫家桥起义的这个连编成第三连，连长

杨绍武，贵州黎平县人。我任第三排排长，一排长姓黄，二排长姓张，叫张绍伍，是剑河县老猫坡人，苗族，后来在怀玉山突围时牺牲了。我们这个连的绝大多数人是黔东南籍的人，都是追随王天培军长北伐来到这里的。在整训期间，方志敏从农民协会抽调一些骨干分子充实我们这个连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编训练，部队的思想觉悟和组织纪律都有很大提高，便分别到横峰、弋阳、德兴一带活动，协助当地农民协会打土豪、分浮财。1928年春节期间，我们在葛阮打了一仗，缴获地方保安团60多条枪，俘虏40多人，有愿当红军的，都留下来补充部队，不愿当红军的便每人发给三块大洋作路费，让他们自行回家。

1930年6、7月间，匡龙海率领我们攻打陆北塘。这时，匡已升任副团长了。团长王道，江西横峰人，是从南昌调来的。当时陆北塘驻有一个保安大队，300多人枪，我们乘晚将敌人包围，拂晓发起攻击，一举歼灭了所有的守敌，并抓住几个有民愤的土豪劣绅交给农民协会处理。这年冬天，我们在弋阳扩编队伍，好几个地方游击队都集体参加红军。我所在的连队已扩编成团，番号是红十军一师一团。团长匡龙海，师长王道，杨绍武任三营营长，姜辉（黎平县人）任二营营长，我任三营八连连长，黄绍辉任二营四连连长；一营长是江西人，他和他的那一营人都是由当地游击队改编的。此外，弋阳边界的一个游击纵队改编成第三团，第二团由原来的一、二连扩编而成。这样，我们这个师的编制算全了。全师共3000多人，分散在横峰、弋阳、德兴、上饶一带活动。

这年冬天，我们团奉命开赴东乡，原打算占领东乡县城，扩大红色根据地。到东乡附近，探得东乡县城驻有朱培德第三军王均的一个独立团。他们武器精良，城池坚固，且有

保安团在城郊设防。两相比较，敌优于我，若强攻，必遭到重大伤亡，便中途改变计划，不打东乡，将队伍开回鹰潭。鹰潭曾一度被我军占领。我们撤走后，敌人派一个营和一个保安大队进驻，当听到我们要打东乡的消息，这里的敌人闻风向金溪方向逃跑，鹰潭实际成了一座空城。我们在鹰潭只驻了一夜，第二天便回弋阳县活动。

回弋阳不几天，游击队派人来报，他们探得弋阳县警备队驻在范敦，共约有 200 多人枪，经常出来骚扰，对根据地的基层政权构成很大威胁，要求我们派人协助消灭这股敌人。我们连夜奔袭范敦，将警备队 200 多人全部包围，用政治攻势将敌瓦解，不费一枪一弹取得全胜。除了一些不愿当红军的发给路费让其回乡外，其余的分开编到各营连，扩大了红军队伍。又将一部分枪弹分送给地方游击队，对这次围歼战所取得的胜利，大家都感到欢欣鼓舞。

1931 年，部队扩大到两个师，游击队员和当地农民协会的许多青壮年男子都加入了红军。队伍扩大了，武器不够用，许多人便以梭标和大刀来武装自己。当时红十军的梭标队是很出名的。这时赣东北根据地的鹰潭、弋阳、横峰、铅山、上饶、玉山等地的乡村和部分城镇已连成一片，到处建立起民主政权，而且发展到闽、浙边界，方志敏同志就是当时的闽、浙、赣民主政府主席。就在这一年的 4、5 月间，我们团从浙江边界的大桥镇撤回来，与其他部队一块集中到弋阳整训了一个多月。到了 6 月中旬，因部队集中过多，给养发生了困难，军参谋长唐刚（四川人）来召集我们开大会，他先总结了整训的成绩，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，号召大家克服困难，争取胜利。大会过后，部队分成三股，一股到上饶玉山一带，一股到德兴，我们第一师则到横峰、弋阳一带地方活动。匡龙海率领我们一师一团，驻扎在莲荷至

横峰之间的乡村里，一边搞训练，一边做群众工作，给养由当地民主政府负担。我们当时的伙食标准很低，经常吃不到盐，有时还用杂粮伴南瓜汤过日子。尽管这样，部队的情绪仍然很高，我们在横峰过旧历年时，当地群众凑一些酒肉慰劳我们，从团长到士兵，大家团聚在一块，打了一个“牙祭”。过年后不久，师长王道率领全师第二次攻打东乡。我们从横峰出发，在山野小道上昼夜兼程，5天的时间走完了300多公里。这次，我们以绝对优势，出其不意地包围了东乡县城，一举消灭了王均的独立团，缴获了400多条枪，俘虏了300多人，因为他们大都是云南人，不愿留下来当红军，部队发给每人三块大洋作路费，打发他们回了家乡。

1932年冬，蒋介石亲自到南昌坐镇，集中数倍于我的兵力对红色区域进行围剿。第三军八师师长韦托带两个团向横峰扑来，想把我们一师一团吃掉。我们避开敌人的锐气，主动放弃横峰向莫家桥撤退。韦托又派遣一个团直扑莫家桥，我们得到探报，便在中途改变行军计划，不直走莫家桥，而将部队分为两部，一部走葛源向西，一部走弋阳向东，两天后在莫家桥汇合，反把他的一团人消灭掉，团长也被我们打死了。解决了莫家桥的敌人，团长匡龙海又挥师南下，乘胜进军横峰，打算在横峰消灭韦托的另一个团。韦托闻风丧胆，带着残兵败将溜回南昌去了。至此，王均的第三军再不敢向赣东北根据地轻举妄动了。

1933年冬天，红十军三个师全部集中在弋阳、横峰一带休整。我们团驻漆工镇，这是方志敏的家乡。休整结束，便在漆工镇过旧历年。年后不久，我害了疟疾病，住院治疗了3个多月，到4月中旬我才回到部队。这时，蒋介石的新七军两个团从浙江的贺村来到上饶，企图以上饶为据点，进而窥视我横峰、弋阳根据地。我们则集中第一师和第二师一

部，以绝对优势，分别从德兴、玉山、横峰三面向上饶包剿，将敌人团团围困在上饶城里，激战两天一夜，终于将这两个团全部消灭，缴获各类枪支2000多条，我们师也伤亡了200多人。全师进驻上饶休整。

1934年7月，红七军团在寻淮州、粟裕等同志率领下，离开赣南的瑞金，经福建、浙江，然后从皖南进入赣东北，在郭源与方志敏会师，合编成红十军团，军长周建屏，党代表方志敏。红十军团有三个师，我们的部队编成第十九师，红七军团编成第二十师、二十一师。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。11月，先遣队分两路北上，一路越怀玉山进军浙江，另一路越怀玉山进军安徽。我们团随方志敏离开赣东北老根据地，经安徽的休宁、汤口等地，到达长江两岸的太平、泾县一带。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路势如破竹的行动，使敌人惊慌失措，他们集中数倍于我的兵力，在太平县的谭家桥一带对我军进行围攻。打了一天一夜，虽歼灭了部分敌军，我们自己也遭受了很大损失。红七军团的寻淮州同志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。方志敏同志看到这种情况，知道硬拼是无法通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的。为了保存抗日力量，决定暂时撤回根据地休整，待机再度北上。于是他和先遣队的其他几位负责人率领部队走在前面，军团长周建屏和刘畴西总指挥率领主力随后跟进。

我们绕开敌人重兵把守的要隘，从那些曲折、艰险而又人烟稀少的羊肠小道，几经周折，于1934年农历十二月回到了闽东北老根据地。我们从离开根据地到回来，前后近两个月的时间，一边行军，一边战斗，部队已是非常的疲劳，加上天气严寒和道路崎岖，我们经常处在极度困难的境地。走在前面的部队要与堵截的敌军作战，后卫部队又与尾追的敌军往往只隔两、三公里。战斗几乎是天天不断。在这种情况下

下，部队的战斗减员和非战斗减员都在不断增加，当我们通过乐平、常山封锁线时，先头部队所剩已不足一个团了。我们于阴历十二月二十三日翻过大茅山进入德新老根据地。当地群众见我们重新打回老家来，都感到非常高兴，许多老爷爷、老奶奶为我们端茶送水，问暖问寒。当看到我们的衣裳单薄，鞋袜破烂，手脚都冻开了裂口，他们都难过地流下了热泪。我们刚进入老根据地两天，便接到消息说主力部队被敌人堵截在怀玉山附近的夹谷里，处境非常危急。为了支援主力部队脱离险境，方志敏同志又率领我们从德兴打回去，当我们快要接近被包围的主力部队时，又遭到国民党第九军金汉鼎部三个师的堵截包围，方志敏同志左冲右突，连续冲杀了七个昼夜，他想尽了一切办法，企图冲出重围，都没有成功。匡龙海团长和另外几个在莫家桥结义的头头，都在这次突围中牺牲了。我们最后被迫撤上怀玉山。方志敏同志把所有的部队组成一个团，命一个姓乔的团长率领，打算在山上坚持一段时间，待机突围。这时我们的子弹已经所剩无几了，伤亡在不断地增加，干部战士都已精疲力竭，敌人却紧追不舍，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。我们舍着命与敌人拼刺刀，想保护方志敏等首长冲出去，结果都没有成功。在反冲杀的过程中，许多同志都英勇地牺牲了，活着的落入敌手，方志敏同志便是在这次突围时被捕，不久就被国民党杀害了。

1934年阴历十二月除夕，我被金汉鼎师警卫连抓住，在审讯时他们问我：“听说话口音，你不是江西人，怎么来到这里的？”我说：“我原是第十军的，被红军俘虏来到这里。”他们便没有杀我，将我补充到特务连。过不几天（大约十一、二天），我打听到周志群的部队在吉安、泰和等地驻防，当金汉鼎部开到进贤县时，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，我乘人不注意，连夜开小差跑去找周志群，在路上跑了7天7

夜，最后在泰和县找到了我外甥曾庆锡，这时他已升任副营长职务，便留我在营部当传令兵。后来，我随周志群从江西打到福建，1936年“七、七”事变后，参加抗日战争，直到抗战胜利。

抗日战争时期贵州省医药卫生概况

罗克聰

抗日战争时期，日本侵略军所占地区，老百姓都遭到大肆烧杀劫掠。在此情况下，大批爱国的人士，先后纷纷内迁到川、滇、黔……等省。因而，贵州省的贵阳，安顺、遵义、平越（今福泉）、定番（今惠水）等城市都迁来不少文化人、教育家、科学家、医药卫生界专家、教授等。这样，原来异常落后的贵州省医药卫生事业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。兹叙述于后：

（一）**医学教育方面**。1938年3月1日成立了国立贵阳医学院，院长由热带病学家李宗恩担任，其他还聘请了许多专家、教授，如：杨济时、李瑞林、杨静波、郭秉宽、贾魁、汤佩松、柳安昌、徐丰彦、严镜清、周金黄、林绍文、汤独新、刘培南、张昌颖、秦作梁、杨铭鼎、张作干、程毓麟、袁印光、宋杰、李漪、刘占鳌、刘谷荪、刘维德、张舒麟、高永恩、郭一岑、高学勤、杨济、金大雄、李贵真、邹子度、沈隽琪、王志钧、林从敏、王世贞、张俊卿等。此外，还有若干兼课教授，如：沈克非、荣独山、张孝骞、吴执中。该院开始设在贵阳市阳明路两广会馆和三圣宫（今贵阳三中），收容战区医药院校学生和新招收学生，于同年6月正式开学。同时还附设了护士助产士学校，同样收容战区学生与新招学生，以适应当时培养人才的需要。1938年秋末，湘雅医学院也迁到贵阳，设在现在的贵溪路湘雅村（原叫鸡爬坎）。同年下半年，陆军军医学校（大学）由南京迁来贵

州安顺县北门外教场坝，后来在安顺城内建立附院，门诊与住院分设两处。该校有医科和药科，以培养军队的医师和药师。军医署和设在贵阳的红十字总会，为了战时需要，建立了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，培养和轮训战地医务人员，设有医师班、护士班、卫生稽查班。因为当时贵州省医药卫生院校没有基础，是从零开始的，1938年下半年又开办贵州省高级医事职业学校，第一任校长由何辑五兼任，因何是省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。这个学校以培养中级卫生人员为宗旨。此外，还有定番（今惠水）卫生院隶属于乡政学院卫生组领导。乡政学院系当时的一个“国际”机构，原设于河北省定县，因芦沟桥事变，该院全部南迁到定番县。该院卫生组组长初为陈荣瑞医师，不久由俞焕文医师接任。那时贵阳医学院公卫学生实习基地，就是在定番县卫生院。乡政学院在抗战后期，由陈志潜医师负责，随后该院又由定番迁往四川省乐山县。和军医学校先后迁来贵州的兽医学校，也设在安顺南门塔的附近，战后迁到内蒙包头，即现在包头兽医学院的前身。

在中医药方面，1937年初，贵州省国医馆在贵阳双槐树（今护国路）成立，由当时省政府财政厅长王激莹兼任馆长。于同年3月又开办了国医研究训练班，接着还开办贵阳国医研究所，与国医馆在一起办公。这个训练班共办了四期，学制有一年、二年、三年，到1944年第四期毕业后就停办了。国医研究训练班与国医研究所这两个单位也就宣告结束了。

以上所举机构，不论哪个医药院、校、班，那时所招收学生（员）都不多，规模也较小。以中医药人员培养进修为例，四期仅四班，总共只有166名学生（员）毕业。当时的毕业生还要分配到省外和军队里去工作，实际上在贵州工作

的还只是一部分。虽然如此，总算是从那时起贵州省便正式有了医学院校，确实是为贵州人民医药卫生事业奠定了基础，对于贵州省保健事业的发展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，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。可是这样的情景，也只有七、八年的时间。日本投降后，湘雅医学院、军医学校和兽医学校等院校很快就搬回原地去了。仅有贵阳医学院算是扎了根而留了下来。但在黔南事变时，贵阳医学院曾迁往重庆，到抗日战争结束才又迁回贵阳。在那时候，还迁到一次挫折，因为有人想把贵阳医学院瓜分和吃掉，不让它迁回贵阳。在那关键时刻，贵阳医学院有远见的教授和校友们积极发起护校运动，经过斗争，才迫使教育部决定让贵阳医学院迁回贵阳，留给贵州为各族人民服务。

（二）医疗机构。

以贵阳地区来说，在抗日战争时期设立的医疗单位也可算盛极一时。其概况如下：

（1）在抗日战争前，贵州的医疗机构基本上是一个空白，在贵阳仅有一个规模很小的贵州省立医院，该院创办于1919年，开始时仅有医师和助产士各一人，只有内科和产科门诊以及普通小外伤和皮肤感染应诊。当时院长兼医师邓文波（光济），助产士若漱（日本籍），而且她就是邓院长的夫人。药剂人员等都是他（她）们自己培养起来的学徒担任。到了抗战时期有了发展，比开办时增添了一定数量的医务人员和设备，由朱懋根任院长，尹觉民任内科主任。该院与贵医合作时，又由陈崇寿和姚寻源先后继任院长。该院地址就是现在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所在地（住院部），院内尚存有一栋旧楼，其余都是新建的。

（2）贵医附院于1939年下半年筹备，1940年底建立医

院，开始时只有病床30—40张，后来很快发展到130张，到贵阳解放时也才发展到150张。门诊有：内、外、妇产、小儿、眼、耳鼻喉、皮肤花柳科；病房有内、外、妇产、小儿科等。

(3) 中央医院分院：即现在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所在地，该院曾由南京迁长沙，再由长沙于1938年秋迁贵阳。该院设备和医务人员的水平在当时都是比较高的，内中有不少知名专家、教授等。当时的院长就是外科专家沈克非教授。此外，尚有湘雅医学院的一些专家也参加了该院诊所工作，如锤世藩、凌敏猷、王绍训、吴执中、胡信德、黄友蛟、梁觉如、许殿乙、陶甫、谢陶羸、张俊杰、林筱丹、黎光旭、徐荫裳、潘世箴及内科专家齐镇恒等。该院也作为湘雅与贵医学生实习基地之一，有病床150—300张，科别是比较齐全的。

(4) 中华红十字会医院与国际红十字会总部设在贵阳图云关。该院拥有国内外专家多人，如林可胜、荣独山、周寿凯、张先麟、屠开元、卢智德、杨文达、林飞卿等。这个医院专门收治战伤病员，包括内科伤员在内，科别较齐全，有病床250—300张。该院为军医学校，贵医和湘雅三院校的学生实习基地之一。当时的专家、教授集中于贵阳，就读医学院的青年学生们学习情绪很高，因为大家都感到国难当头，有了这样的学习机会，确实不易。那时教授们也正值精力旺盛的年代，虽然不是一个单位的，却能真正和睦相处，同舟共济，相互帮助，共同提高。师生之间，同学之间均甚友好。凡有学术活动，彼此相告一起参加，每次学术活动参加的人都很踊跃，会场里座位，一加再加。三院校的临床病理讨论会，轮流在贵阳中央医院和贵医附院举行，三单位教师均自由参加，学术空气十分浓厚。

(5) 贵阳传染病院：该院设在贵阳金沙坡附近的打铜街

和太平巷，设备简陋，规模极小，仅有20张常设病床，不能适应传染病流行时患者住院的需要。如在1938、1939、1940年连续3年霍乱病流行时，只好在贵阳太平巷和会文巷正谊小学内以及打铜街分设急救站，病人住在走廊上、院子里等处，有的霍乱病人把生理盐水注射完毕，脱水缓解，酸中毒纠正后，就被动员回家。

(6) 省医事职业学校附院：该院在抗战后成立，以门诊为主，仅有病床20张，供对学生示教之用。该校校长为陈淑珠。

(7) 贵阳产院：该院设在威清门外，与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相邻，以产科为主，兼办妇科。

(8) 贵州妇幼卫生所：该所设在世杰花园附近，主要搞幼儿保健工作，实际上只对幼儿搞门诊工作为主，也对少数妇科病人进行治疗工作。机构小，规模也小。

(9) 贵阳结核病防治站：该站设在水口寺汤耙关附近，今贵阳猪鬃厂的后面，主要是把开放性肺结核病人住在那里隔离起来。那时的治疗药物，链霉素和异菸肼都没有。

(10) 陆军医院（后方性质的）：该院设在镇宁县，系由省外随军而来的，主要是为军队服务。吴怀廉任院长。

(11) 东山医院：该院系由西南公路局所办，为现在的贵州省交通医院住院部的前身。

(12) 省陆军医院：该院设在现在贵阳卫生材料厂所在地；院长由邓文波（光济）兼任。

(13) 教会及私人所办医院：1915年铜仁教会所办医院名“福音医院”，地址在现在的铜仁专区医院所在地；1918年贵阳天主堂（北堂）设有若瑟病院，有病床50张；1923年贵阳有个布德医院，设在慈善巷，据资料载每月就诊者达3000余人次；1934年贵阳还有个路易医院，设在南堂（博爱

路)；1925年在贵阳郭家湾设有婴儿医院，有病床25张；1930年在贵阳普定街(今黔灵西路)设有景武医院，是乐景武医师私人办的。

(三) 卫生行政机构

1938年4月成立了贵州省卫生委员会，主管全省卫生行政事务。由孙希文、周貽春、何辑五、李宗恩、杨崇瑞、姚克方、朱章赓7人组成；常务委员会由何辑五、朱章赓、周貽春三人组成，并由何辑五任常务委员会主任。该委员会于是年6月又成立健康教育委员会，主任委员是朱章赓，常务委员为戴天佑等，委员为严镜清(当时贵医公共卫生科教授)及范日新教授等。同年10月又成立省自救委员会，由省卫生委员会领导；其成员除当时政府官员外，尚有朱懋根、范日新、伍宗裕、乐景武、高逸民等医师参加。

省卫生委员会1940年4月召开第一次卫生行政会议，决定在委员会下分设六个组：(1)行政组：由戴天佑、范日新、韩恕、张崇德、魏建宏、赵光钺、李德溥组成。(2)卫生教育组：由戴天佑、金理财、蒋会泽、沈元晖、潘瑾组成。(3)防疫统计组：由俞焕文、甘怀杰、郭景行、盖宝璜、李志忠、杨希荣、乔树民、张人俊组成。(4)戒烟组：由王纪民、蔡谦、江德晋、管毓鲁、汪庚秋、郑致组成。(5)环境卫生组：由杨铭鼎、吴抗勉、崔俊升、许德约、陆祖仁组成。(6)妇幼卫生组：由李瑞林、陈本真、杨励杰、管葆贞、李方岱、沈育民、陆祖仁组成。在这个卫生行政会议上，由张崇德作关于《贵阳卫生事务所工作报告》；另一报告为《卫生试验所工作报告》；还有《健康委员会工作报告》。杨济时教授作关于《医院管理问题》的报告。此外，还有一个报告是《定番(今惠水)县卫生院工作报告》。该卫

生院隶属于乡政学院卫生组领导，乡政学院分三个组：经济组、农业组和卫生组。卫生组组长初为杨崇瑞医师，后由俞焕文医师继任。

1940年成立贵州省卫生处。第一任处长为姚寻源，第二任为姚克方，第三任为施正信，第四任为贾智钦。内设办公室、防疫科、医政科、药政科、公共卫生科等，人员编制有30—40人。该处设在现在的贵州省粮食局后面。

1938年4月建立贵阳卫生事务所，由范日新任第一任所长，到1939年改由张崇德任所长；1941年贵阳市政府成立后，改为贵阳市卫生局。内设办事机构与贵州省卫生处基本相似，只是人员编制和规模小一些。该局地址在陕西路（今环管站内）。历任局长为张崇德、何思惠、王贵璠、陈家琪、沈守成、戴必正。这些局长都是医师，对卫生防疫工作都有相当经验。

那时，贵阳有一个中华红十字总会。由林可胜教授任会长，他还兼任图云关红十字会总医院院长。红总会就设在图云关总医院内。该总会与国际红十字会有密切联系。红十字会医院的设备系由国际红十字会所资助，故在设备方面那时算是不错的，而且还可以通过国际红十字会，把日本侵略者的细菌战和其他暴行向国际上宣布，让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都来谴责它。

那时还有由南京迁来的中央卫生署卫生实验处，设在两广会馆内，与贵医为一墙之隔，实验室设备齐全，也有不少专家在处内工作。姚克方处长兼任贵医实验诊断的教学工作，另有谭世杰、甘怀杰等专家也在卫生实验处工作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在贵州省卫生委员会领导下，先后在67个县设立卫生院、所。人员和设备都比较少而且差，但其中贵筑（今花溪区）、惠水、遵义、望谟、清镇、平越（今福